

编者按:日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随着超过2200家发电企业被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我国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我国的碳市场建设是从地方试点起步的。从2011年10月以来,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等地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地方试点从2013年6月陆续启动了交易,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

试点市场覆盖了电力、钢铁、水泥等20多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到今年6月,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达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114亿元。重点排放单位履约率保持很高水平,市场覆盖范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促进了企业温室气体减排,强化了社会各界低碳发展的意识,为全国碳市场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全国碳市场对碳达峰、碳中和的作用和意义非常重要。目前全国碳市场刚起步,还在培育期。在正式上线交易后,我国的碳价超出了之前的预期。全国碳市场启动前,从7个地方试点运行情况看,近两年加权平均碳价约在40元左右。7月16日,全国碳市场开放首日,碳排放配额开盘价为48元/吨,收盘价51.23元/吨。未来随着政策收紧和减排力度提升,碳价势必还会上升。

本期推出“全国碳市场‘开张’”专题,有针对性选取相关文章,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后的交易情况、市场感受等入手,通过专家解读,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全国碳市场发展。希望能为盐城市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思索和方向。其他栏目的文章也期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全国碳市场“开张”

- 02 全国碳市场“开张”6天看点满满
- 04 碳市场“开张”,电价会上涨吗?
- 06 徐忠:对碳市场最新进展的思考
- 09 全国碳市场空间将破万亿,普通人也能做“卖碳翁”吗?

文化漫步

- 11 泉州申遗成功,这座古城有哪些隐藏魅力?

悦读时光

- 18 何建华:发力打造江苏高质量发展“沿海轴”

主 管:盐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黄兴港

副 主 编:张安红

责 编:祁 杰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762528568

邮 箱:1015873743@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单位: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日期:2021年7月28日

印 数:9200-9400

全国碳市场“开张”6天看点满满

7月16日,备受瞩目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截至7月23日收盘,全国碳市场“开张”运行已有6天。交易情况如何?企业感受怎样?远景期待几何?开张以来的全国碳市场看点满满。

交易看点 “稳定”与“摸索”

碳交易指的是,政府通过相应机制发放给企业碳排放配额,一旦企业的实际排放超过其拥有的配额,为了完成履约,企业就需要在碳交易市场购买其他市场主体的配额。纵观6天的全国碳市场交易情况,业内人士的评价是:碳价格较为稳定,企业尚在摸索中。

数据显示,到7月23日收盘,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运行6个交易日,23日的开盘价为56.52元/吨,收盘价为56.97元/吨。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达到483.3万吨,成交额近2.5亿元,其中开市首日的成交额近2.1亿元,6个交易日以来挂牌协议交易和大宗交易均有成交。

碳价格并未出现大幅涨落,最低价为48元/吨,最高价为61.07元/吨。除首日收盘价较开盘价上涨6.73%外,其他几个交易日碳价格较为稳定,收盘价较前一日涨幅均在3%以下。隆众资讯研究员毕雁飞表示,从长远来看,碳排放权交易价格还有一定上涨空间。

碳交易数据显示,6个交易日以来,除了首日成

交量达410.40万吨外,其他几个交易日成交量多数在20万吨以下。有参与企业交易人员表示,不少企业处于碳交易摸索阶段,还在积累经验,随着后期企业参与度不断提高,市场活跃度也有望得到提升。

企业看点 更有动力节能减排

发电行业是首个纳入全国碳市场的行业,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超过2000家。对于最先在全国碳市场中试水的发电企业来说,这一周它们对“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有了更深的认识。

“开启碳交易对于高排放的发电企业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主动减排的动力更足了。”有发电企业碳交易人员表示,不减碳就意味着企业需要面对越来越高的排放成本,在市场倒逼之下,企业以绿色环保为驱动力,规划低碳转型发展战略的主动性会明显提升。

“我们的不少客户都是来自碳市场将重点覆盖的高耗能行业,碳市场的开启,不仅意味着减碳将获得收益,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市场机制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意识转变。”施耐德电气全球供应链中国区负责人张开鹏说,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对于下游企业来说,是否重视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施耐德选择上游供应商时的重要参考标准,这对于整个工业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发展将产生积极意义。

与此同时,全国碳市场的开启,也帮助发电企业在节能减排工作上,有了“全国一盘棋”的统筹视角。中国华电集团碳资产运营公司的交易员张壮表示,在没有全国碳市场之前,各地电厂的碳配额只能在本地区进行流通,不同试点区域的价格不一、规则不同,给发电企业的碳资产运营带来不少问题。“全新上线的全国碳市场,使得发电企业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对各地电厂的碳配额进行统一运营和调剂,有利于企业更好推进节能减排工作。”

未来看点 更完善、更科技、更深化

全国碳市场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面向未来,业界认为,碳市场需要更加完善,低碳科技需要重点发展,全民减碳有望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最大蓝海。

根据生态环境部测算,首批纳入企业的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中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有专业人士指出,全国碳市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最大”碳市场将处于较长的完善期。“未来随着

碳价机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碳市场将会成长为年交易额超过千亿元人民币的大市场,并为全社会的减碳行为提供价格信号乃至资金支持。”张壮说。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丹也表示,随着碳排放变得更加昂贵,未来企业会有动力进行设备升级,相关企业的交易数据也将作为绿色金融标准的一部分,为企业在获取融资或者更低成本的绿色信贷上提供便利。

除了碳市场,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认为,未来“双碳”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个是低碳科技的攻关,另一个是全民减碳意识的提升”。在他看来,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将会极大推进“双碳”工作,因此需要我们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除此之外,更广泛的公众参与也是关键一环。“绿色出行、简约包装、垃圾分类……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能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提供推动力量。”程鹏说,“双碳”工作的这“最后一公里”需要每个人的低碳足迹来“填满”。

(2021-07-24 新华社)



碳市场“开张”，电价会上涨吗？

日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随着超过 2200 家发电企业被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我国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在喜迎碳市场“开张”的同时，社会上也有一些担心。比如，碳交易价格如何？会否增加发电行业成本？会否引发居民电价上涨？对此，经济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碳价将逐步提高

目前，国际上对碳定价主要有两种方式，分别是碳税和碳市场。

碳税属于行政命令，政府对企业强制征收，规定了碳的价格，但无法确定未来排放量；碳交易属于市场方法，通过政策规定碳排放总量，而碳的价格由市场交易自身决定。

世界各国根据自身情况有不同的选择。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截至 2020 年，全球共有 61 项已实施或者正在规划中的碳定价机制，包括 31 个碳排放交易体系和 30 个碳税计划。

在碳税和碳市场二者中，中国选择的是碳市场。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此前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介绍说，国内外实践表明，碳市场是以较低成本实现特定减排目标的政策工具，与传统行政管理手段相比，既能够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又能够为碳减排提供相应的经济激励机制，降

低全社会减排成本，并带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投资，为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正式上线交易后，我国的碳价超出了之前的预期。赵英民介绍，全国碳市场启动前，从 7 个地方试点运行情况看，近两年加权平均碳价约在 40 元左右。7 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开放首日，碳排放配额开盘价为 48 元/吨，收盘价 51.23 元/吨。

“未来随着政策收紧和减排力度提升，碳价势必还会上升。”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目前全国碳市场刚起步，还在培育期，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希望企业能尽快熟悉规则，并主动走上低碳发展的轨道。

同样，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认为，目前碳交易刚刚开始，随着交易量的增加，碳价会逐步提高。但会是一个温和提升的过程，不会出现特别剧烈的变化。

传统电企成本增加

目前，全国碳市场首批仅纳入了发电行业，也就意味着碳市场以电力行业为突破口，发电企业将率先开展碳交易。

“碳交易从发电行业开始，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林伯强分析说，一是发电企业是中国最大的碳排放板块之一，消耗了将近一半的煤炭；二是发电行业在

碳排放方面统计难度较低，比如总计消耗了多少煤炭等，加之大多是国企，执行起来相对较容易；三是目前我国的电价尤其是居民电价稳定，碳交易成本不会轻易向产业链下游传递，这意味着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可控的。

从国际经验看，因为二氧化碳排放量大、煤炭消费量多，发电行业都是各国碳市场优先选择纳入的行业。发电行业首先纳入，可以同时发挥减污降碳协同的作用。

国网能源院发布的《中国能源电力发展展望2020》报告显示，随着终端电气化水平持续提升，电力需求将在2035年前保持持续快速增长，部分碳排放将从终端用能部门逐步转移到电力行业，电能将逐步占据终端用能的核心地位。

目前，我国碳市场配额，采取以强度控制为基本思路的行业基准法，实行免费分配。分配配额时，会基于企业的实际产出量，对标行业先进碳排放水平。不过，原则上来说，分配给企业的碳排放配额会逐年递减，以此促进企业减排。

林伯强表示，由于成本上升，靠燃煤发电的火电行业会受到一定影响，与之相比，新能源发电行业，如可再生能源发电、核电等产业就有了比较优势。从补贴支持到依靠市场化改革的变化来看，也意味着我国的清洁能源上了一个台阶。

林伯强分析，种种影响会倒逼电力企业权衡各方成本，开发更多新的业态，转变商业模式，增强自身金融属性，投入新能源的蓝海。

阶梯电价制度将完善

“碳价上升带给发电企业的压力会向电价传导。”林伯强表示，电力作为基本投入，国家会保持行业基本面稳定，但电力改革一定会跟上来。

事实上，近期关于电力改革的声音明显增多。

7月15日，安徽省发改委官网发布了《关于试行季节性尖峰电价和需求响应电价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近日的回复中坦承，长期以来我国试行较低的居民用电价格，居民电价较大幅度低于供电成本，是因为工商用户承担了相应的交叉补贴。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电价偏低，工商业电价偏高。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按照进一步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要求，下一步要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逐步缓解电价交叉补贴，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形成更加充分反映用电成本、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居民电价机制。

“国外大都是居民用电价格比工业用电价格高。”林伯强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居民用电分散、用时集中于峰时等原因，成本高于工业用电。不过，我国一直延续了工业用电价格高于居民用电价格的状态。

林伯强分析说，目前来看，电力成本上升向工业传导的可能性较大，但并不意味着居民用电就会一动不动，也有可能温和调整。

（2021-7-26 经济日报）



徐忠：对碳市场最新进展的思考

提 要

- ◎ 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碳市场,下一步重点是要形成更加有效的碳市场。
- ◎ 尽快明确总量设定、配额分配由免费逐步过渡到拍卖方式、推动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形成能产生足够激励且相对稳定的碳价格、推动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等。
- ◎ 应将碳交易市场定位为金融市场,将碳交易纳入金融市场体系和风控框架;目前正在修订的《期货法》应将碳配额衍生品纳入交易品种。
- ◎ 碳价格要想形成对全社会生产、消费等行为的牵引,还取决于能否形成顺畅的价格传导。中国目前电力价格还存在一定的管制问题,并非完全的市场化定价。这种情况下,碳价格信号的传导就可能阻滞在电价环节。
- ◎ 发达国家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其收益必须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否则不符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是变相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要有前瞻性的应对。
- ◎ 如果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坚持执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举措,中国应尽快扩大国内碳市场和碳定价的覆盖范围,并对出口至发达国家的商品征收一定水平的碳税,从而将这部分税收留在国内,用于支持中国的低碳发展。

——徐忠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

对碳市场最新进展的思考

最近关于碳市场有几个方面进展值得关注。一是中国全国碳市场在7月16日正式启动了,收盘价突破每吨52元人民币。二是7月14日欧盟提出碳

减排的一揽子方案,包括实施更严格的碳交易体系,并扩展碳交易覆盖范围,以及防止碳泄漏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涵盖电力、钢铁、水泥、铝和化肥五个领域),作为其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重要补充。我想结合这些新的进展,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一、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碳市场,下一步重点是要形成更加有效的碳市场

中国的碳市场是从地方试点开始起步的,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福建等地方试点,目前最终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碳市场,初期仅纳入发电行业就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碳价格,可以提高碳市场的流动性以及定价的效率。同时也要看到,当前的全国性碳市场还有一些重要方面需要完善。

第一要尽快明确总量设定。碳排放总量是根据覆盖范围内的历史排放情况以及总体减排目标来确定未来一定时段的排放总量,这个总量目标确定不了,会对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欧洲碳市场在金融危机之后,碳价非常低,客观上与总量的“挤牙膏方式”有关系。金融危机期间,工业、商业活动减少导致所需碳配额减少,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盈余、碳价格下降,企业减排动力下降。为应对配额盈余,短期内欧盟将一定数量的配额拍卖推迟。为进一步增强碳交易体系韧性,2019年1月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开始运行市场稳定储备机制,即不是根据价格波动、而是根据流通的排放配额数量来决定向市场增加或从市场收回排放配额。

目前,中国碳减排的总量目标还不清晰,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此外,在设定总量目标的前提下,应拿出足够比例的碳配额进入碳市场。同时应考虑构建价格稳定机制,帮助投资者形成碳价逐年上涨的预期,更有利于促进减排。

第二要完善配额的分配。配额分配方式决定了配额的稀缺性,从而决定了碳价格的高低,是价格形成的第一步。从目前已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来看,配额拍卖已成为分配配额的主流方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初期以发电行业为参与主体,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配额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

我国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仍在起步阶段,采用免费分配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应逐步增加配额拍卖比例,促进碳排放

合理定价。增加配额拍卖比例,一方面发挥市场化手段促进碳定价,另一方面拍卖收入可作为政府公共收入,投入低碳发展行动中。

国际上常见的配额分配方法包括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免费分配配额方法分为祖父法和基准法,拍卖即有偿购买碳配额;目前,欧盟碳市场默认的分配方式是拍卖,也有少部分为了防止碳泄漏或鼓励特定行业、企业发展而给予的免费额度,但预计后期会逐步取消。拍卖分配另一个重要的功能是形成支持低碳发展的公共资源。欧盟成员国、英国和欧洲经济区国家2012-2020年拍卖收益超过570亿欧元,2019年拍卖收益超过141亿欧元,其中有77%用于气候和能源目的。

我国资源与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呈逆向分布,煤炭集中于内蒙古、山西等省,原油集中于陕西、黑龙江等省,天然气集中于河北、山西等省。为了低碳发展平稳转型,需要帮助高碳地区、行业应对冲击及转型,当下中央及各地财政比较紧张,碳市场的拍卖收益支持部分地区和行业的转型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第三要推动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形成能产生足够激励且相对稳定的碳价格,并以金融监管的理念进行管理。

中国的全国性碳市场尽管规定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个人可以参加,但目前只有控排企业能参与,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还未参与进来。没有金融机构的参与,碳市场在价格发现、预期引导、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将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影响减排目标的有效达成。欧盟碳市场的参与主体除了控排企业之外,还包括银行、基金、经纪交易商等各类型的金融机构。

我们应将碳交易市场定位为金融市场,以金融监管理念进行管理,加强交易产品、机制及参与者的金融属性,推动衍生产品创新,提高市场流动性,将碳交易纳入金融市场体系和风控框架;目前正在修订的《期货法》应将碳配额衍生品纳入交易品种。依托现有金融基础设施,以市场化、专业化方式构建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有效利用已较为成熟的市场管理

经验,提高机构投资者参与度,发挥市场成员的自律管理功能。

第四,碳价格要想形成对全社会生产、消费等行为的牵引,还取决于能否形成顺畅的价格传导。电力行业在碳排放中占比差不多一半,电价是最重要的“二传手”。中国目前电力价格还存在一定的管制问题,并非完全的市场化定价。这种情况下,碳价格信号的传导就可能阻滞在电价环节。

下一步,中国要在建立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形成更加有效的碳市场和好的碳价格信号,助力低碳平稳转型。包括尽快明确总量设定、配额分配由免费逐步过渡到拍卖方式、推动金融机构的广泛参与、形成能产生足够激励且相对稳定的碳价格、推动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等。

二、发达国家提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其收益必须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否则不符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实际上是变相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要有前瞻性的应对

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碳达峰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还在往上走,所处阶段不同,碳价应是不同的。为防止碳泄漏,发达国家提出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相关收入也必须全部返还用于支持出口国、资源国等的低碳发展,体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属性。

尽管目前欧盟的碳排放量仅占全球的8%左右,

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其累计的碳排放量是全球最高之一,占到24%;美国占到25%;中国占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累计排放只占到13%。如果发达国家没有对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收益的合理安排,只是出于保护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符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精神,实际上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

气候问题在经济学上是一个典型的“公地悲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际集体行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刚刚实现,人均GDP水平并不高、还面临不少发展问题的困难情况下,中国仍在2020年底向世界承诺了“30·60目标”,这是非常有担当的。反观发达国家,本应按照之前达成的国际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给予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现在不仅没有资金支持,还打算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等措施。这不利于凝聚全球共识,共同抗击气候变化,反而会导致出现“公地悲剧”。

对可能出现的发达国家利用征收碳边境调节税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要有前瞻性的应对。如果发达国家从贸易保护主义出发,坚持执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举措,中国应尽快扩大国内碳市场和碳定价的覆盖范围,并对出口至发达国家的商品征收一定水平的碳税,从而将这部分税收留在国内,用于支持中国的低碳发展。

(2021-7-26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全国碳市场空间将破万亿，普通人也能做“卖碳翁”吗？

碳市场的建立让企业开始用最熟悉的“成本思维”重新审视节能减排这件事。

如果你是一位环保主义者，那么恭喜你，未来，低碳行为可能成为你赚钱的新门路。目前，已经有企业率先开始从碳减排行动中获利。

一

7月16号上午，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开市。

9点30分，碳市场的首笔碳交易顺利成交，成交量16万吨，交易额790万元。

首批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是2000余家发电企业，它们的碳排放总量超过了40亿吨二氧化碳，这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一启动，就成为了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二

什么是碳市场？简单来讲，碳市场就是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当作一种商品来进行买卖的市场。我国的碳市场分为强制性的配额交易市场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市场。在强制性的配额交易市场中，企业交易碳配额。

这个市场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主要分为两个步骤：

首先，政府确定整体碳排放目标，然后把初始的碳排放额度分配给交易体系中的企业。政府如何确

定给某个企业分配多少额度呢？

简单来说，有关部门通过行业的历史排碳强度划定基准线，再结合企业的产能情况，就可以确定某个企业的碳排放额度。

接下来，企业就可以在碳市场上自由交易碳排放额度——成功减排后有额度剩余的企业可以出售多余的碳排放额度来获利，而超额排放的企业则需要要在市场上购买配额。

举例来说，如果A企业每年的碳排放配额是1万吨，而它通过技术进步，把碳排放量减少到了8000吨，那么A企业就可以把多余的2000吨配额拿到碳市场上出售。如果另一家B企业的碳排放配额也是1万吨，但由于扩大生产，B企业需要超额排放2000吨二氧化碳，那么它就可以在碳市场上购买A出售的2000吨碳排放配额。目前中国的碳市场交易主要就以这种配额交易为主。

接着说说CCER市场。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这个名词看着实在不怎么友好，但理解起来并不难：如果企业通过开展环保项目（比如林业碳汇、水电、光伏、沼气项目），对减少碳排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它就可以向有关部门申请CCER，来抵消自己实际生产中的碳排放。

举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

你在蚂蚁森林上种过树吗？通过践行低碳行为，

积累“绿色能量”，你在蚂蚁森林里种下一棵棵虚拟的树，而蚂蚁集团会相应地在荒漠化地区种下真正的树。未来，CCER 交易就可能成为蚂蚁集团进入碳市场的主要途径。

蚂蚁森林是一个林业碳汇项目。这个碳汇的“汇”是汇集的意思，所谓的“林业碳汇”，指的是通过开展林业项目，依靠植被吸收和固定二氧化碳，来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和外汇概念没有半毛钱关系）。蚂蚁森林这个环保项目如果通过有关部门的核准，就可以被用于申请 CCER，而申请到的 CCER，就能被用来进行交易。

如果未来蚂蚁集团真的通过 CCER 交易进军碳市场，你在蚂蚁森林项目里种下的一棵棵真树，就都成了“碳资产”。对此，蚂蚁森林还专门发布一条微博称：“目前全球正在积极探索将个人碳减排量纳入碳交易体系。如果蚂蚁森林里记录的个人碳减排量未来能交易，产生的所有收益将属于用户个人，不属于蚂蚁森林。”也许，碳市场开放个人碳交易，也就是我们把自己的碳资产变现的这一天真的已经不远了。

但要补充说明的是，和配额相比，CCER 的使用限制比较多，比如说，重点排放单位最多只能使用 5% 的 CCER 来抵消自己碳排放配额的缺口。

而且 CCER 交易受政策影响大，所以 CCER 的价格常常大幅低于配额价格，而且波动较大。目前，CCER 交易只是对配额交易的一种补充，它处于起步阶段，只占到碳市场交易中很小的比例。

三

那么我国建立碳市场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控制企业碳排放的问题上，过去，中国一直依赖政府来发号施令。

但从企业的角度看，自己排放的那一点二氧化碳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并不明显。更直白地说，企业觉得全球变暖和自己没什么密切关系，而且减少碳排放还意味着自己要额外支付更多的钱，所以企业没有动力主动采取措施来降低碳排放。

有了碳市场，情况就不一样了。

通过市场化的制度安排，企业开始用自己最熟

悉的“成本思维”重新审视节能减排这件事——怎样尽可能地在碳市场中少花钱，甚至多赚钱？

碳排放权交易切实地关系到企业的荷包，所以它能倒逼企业通过优化能源结构等手段，主动降低能耗，从而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四

国际上很早就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实践。早在 2005 年 1 月，欧盟就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温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体制。目前，欧盟碳市场已经覆盖了所有欧盟国家的 1 万余家企业。根据金融数据公司路孚特对全球碳交易量和碳价格的评估，2019 年，欧盟的碳排放交易额达到 1690 亿欧元，占到全球碳市场份额的 87%。从减排效果上看，碳市场的作用也很明显——2019 年，欧盟的碳排放量比 30 年前减少了 23%。而我国从 10 年前，也就是 2011 年起，就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 7 个省市试点区域性的碳市场。2016 年，福建试点启动。

截止到 2020 年底，全国 8 个试点碳市场的累计配额成交量达到 4.5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累计成交额超过 105 亿元。到了 2017 年，全国性碳市场的建设被提上议事日程。但建设进展一度比较缓慢，直到去年 9 月中央政府确定了“双碳”目标后，全国性碳市场的建设才开始加速。据估算，今年中国碳市场的成交量可能达到 2.5 亿吨，交易金额将突破 60 亿元人民币。

在十四五期间，除了发电行业外，石油、化工、钢铁、建材等 8 大重点能耗行业都将被纳入到碳市场，8 大行业的控排企业（指被强制纳入碳市场总量管制和交易体系的企业）数量将达到 1 万家。

同时，中国碳市场的参与主体将会从企业逐步扩大到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市场的交易品种也会从现货扩展到期货、碳指数等衍生品领域。

未来，中国碳市场的总体规模可能突破 1 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碳排放权交易不仅将成为促进企业降低碳排放的具体手段，还将丰富金融市场的资产类别，为投资者提供又一项投资选择。

（2021-7-28 吴晓波频道）

泉州申遗成功,这座古城有哪些隐藏魅力?

2021年7月25日,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升至56。

北大人类学系教授王铭铭的《刺桐城》一书中提到:宋元泉州给我们的挑战在于,在传统国家的边陲,文化多元曾达到的程度大大出乎习惯于将传统国家与封闭社会对等看待的学者的意料之外。

方言是我们了解地方的窗口和途径之一。漫长的历史沉积与对外开放性,在泉州方言中留下了何种痕迹?给泉州带来稳定性和流动性的不同动力,将如何在互动中塑造泉州话?在方言的小宇宙中,泉州人以何种身份和形态栖居,既与国家,又与世界保持联系和纽带?通过一窥泉州话,我们能够触碰到泉州的历史时空。

在方言的韵律中,层层叠叠的历史发出回响,变幻挪移的空间投下踪影,祖先的灵魂栖居其中。本刊主笔蒲实曾在《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51期封面文章中探访过泉州,今日我们重发此文,再次感受泉州的文化魅力。

主笔 | 蒲实
摄影 | 张雷

泉州:一个样本

这几年写世界博物馆和中国古代史,曾几次与“泉州”这座城市的名字相遇,使得我对它的好奇不断增长。

一次是写大英博物馆时,读到中国馆馆长霍吉淑编写的中国藏品目录《中国:物中的历史》一书,泉州作为马可·波罗来中国时停靠的港口被呈现。第二次是在写摩洛哥时,我到达国际自由港城市丹吉尔,在那里听说一位14世纪的伟大柏柏尔人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他到过中国,曾在泉州做过较长时间的停留。泉州这个名字在那时成为一个未被完全认识的、开放古代世界的临海一隅,对抗着我对古代中国封闭性认识的印象。

第三次是写魏晋南北朝,读到《隋书·食货志》中的一段话:“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我揣摩着魏晋之际政治格局各种变动之外,南渡之人无时无刻不怀念故都洛阳的微妙思乡之情。建康(今南京)虽是移民的“定居地”,但这些南渡者不仅被称为“侨人”,用原来北方的地名在南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只有名称,并无实土,所谓“故土虽迁,存旧名”。一百年来,他们顽固地保留着北方人的习惯,集群而居,自报家门,填写的籍贯总是北方故乡的郡县。

那些没有去建康而去了东南沿海其他地方和港

澳台地区的人,则被称为“客家人”。他们身居异乡,对于故乡阿洛(以洛阳为中心的洛河流域)地区充满留恋,自称“阿洛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多数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福建客家土楼和泉州洛阳桥就是这种遗风的见证。

带着对泉州不断累积的兴趣,我在北大人类学系教授王铭铭的《刺桐城》一书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宋元泉州给我们的挑战在于,在传统国家的边陲,文化多元曾达到的程度大大出乎习惯于将传统国家与封闭社会对等看待的学者的意料之外。这样,当我们决定下来写方言这个封面时,我选择来看一看泉州。

容 器

徐秀霞骑着摩托带我钻进夜晚热闹的西街胡同。她是一位打城戏演员,四十来岁。见到她的几天前,我在高甲戏剧院看了一场他们的排练,那天的剧目是《大闹天宫》。打城戏是泉州民间地方剧的一种,实际上由做道场的仪式演化而来,保留着许多神鬼故事,关于阴间的一些场景有时会吓到已与这种传统日渐疏离的年轻人。

排练间隙,她给我讲了一件许多年前发生的往事:一位演员在走台时陷入了脚下的八卦阵,“他在台上不停打转,怎么都出不来,很可能已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我的老师傅”,她边说边从手机里翻出一位迥然有神的老者的照片,“就是他,立即画好脸谱走上台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使劲儿拽出来”。她见我听得来劲儿,就借给我一本《目连救母》的书,是打城戏最有名的一出,让我在离开泉州前再还给她。这部戏完全以泉州方言写成,我没有看懂。几天后,她接过我还的书,让我骑到她的摩托后座上,“我带你去见一些西街的‘草根’朋友”。

她带着我进了胡同深处一家位置隐蔽的客栈。夜色中,我们穿过两进院落的中庭,从一个楼梯通道登顶露台,可以俯瞰几乎清一色红砖坡屋顶的西街。唯一戳破天际线的是开元寺的东西塔。在许多城市

都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旧城改造之后,泉州老城完整保存下来的旧风貌成了与众不同的“奇迹”。

这种保守性与泉州人内心的秩序有关:按传统老规矩,泉州旧城的建筑均不得超过东西塔的第三层。资本在很多地方都突破了传统规矩,但泉州人“敬天地,畏鬼神”的杂糅信仰却构筑起异常坚固的堡垒。听泉州人说,当年曾有人在旧城区建起过一座摩登高楼,城里很快流传开那幢楼闹鬼的故事,楼也就一直被空置了,从此无人再建。

客栈的女主人郑达真是徐秀霞的戏友。在厦门读完大学,她回泉州和朋友们一起开了这家客栈,平日生活主要是写书法、唱戏和经营。她是“80后”一代,在学校里学的是普通话,说的已不是最地道的方言,“习惯性地会从普通话直译一些词语,但按照泉州方言的发音,其实是错的”。比如,“蜻蜓,我会读 qing ting,但其实地道泉州话把‘蜻蜓’叫做‘田蠅’(念作 can yi),是田里飞的虫子拍打翅膀时发出来的声音。蝴蝶,我直接翻译为 hu die,但泉州话其实把‘蝴蝶’叫‘尾蝶’(念作 ber yia)”。

郑达真正在学当下泉州很流行的一支入门南音《直入花园》,另一支流行的入门曲是《风打梨》。南音源于宋徽宗设立的南外宗正司迁至泉州带来的宫廷曲艺,作为纯音乐,它在体系的完整性和复杂度上几乎可媲美西方古典音乐。它也从泉州流传于东南亚,但唱词及语音始终以泉州话作为标准。今天能够听懂南音的人越来越少,实际成为一个狭小的圈子,通道也非常窄。一个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热情才能真正了解南音,这个圈子逐渐也不再是泉州和外地人之分,而成为行业之分,“行业内”人数屈指可数。泉州人说,在文庙的李氏茶庄、金鱼巷的南音馆,常年仍然坐着一些老人家,“他们一根接一根地点着烟,一听就是一个晚上。若问他们,其实也不一定听得懂,甚至已不知道音乐里讲的是什么事情,只是沉醉在旋律中”。

泉州德高望重的方言专家王建设在他研究闽南方言戏文的《明弦之音》一书中写,南音演唱是严格的师承,它的唱词所保留的古代泉州音,有的比成书

于200年前的《彙音妙悟》还要古老。它的唱词有一种以一个独特发音为介音的系列韵母,被称为“鹧鸪音”;也有一种方言地区人说普通话但仍夹杂着方言音的“蓝青官话”。

《直入花园》的歌词乍听唱的是美妙的花园风景:“直入花园是花味芳,田螺飞来都真于成阵,尾蝶飞来都真成双,冥阳岭上是好蹊跷。……六角亭上是六角砖,六角亭下都好茶汤,六角亭上六角石,六角亭前都好棹箬”。郑达真想象,六角亭和六角砖应该就是古代泉州的模样。直到长辈讲解起这支曲子的意思,她才明白,“冥阳岭”是进入到另一个世界的标识,此后的“六角亭”“六角砖”已专指冥间的建筑样式。这个“花园”原来是进入死后世界瞥见的景象,这首入门曲仅仅唱了很浅层的、初见的那一瞥。坐在厅堂桌边一起喝茶吃点心的一位年长的泉州人,对民俗掌故很熟悉。他说,这首极为浅显的《直入花园》映射出民国以前盛行于泉州的民俗。“福桥那边有很多‘花园’,过去‘到下面去’的氛围很浓。那里的空间也不只是花园,写下来的大多美好,有速报司那样的机构,像今天的法院,大都跟劝善有一些关系”。过去有许多以“通灵”为业者,通常不识字,受人之托去“那边”察看诸如祖先或未来的形状,且要在绝对安静的环境中进行,以免陷入时空乱流,“与楚文化的巫术有几分相似”。

这个空间的存在让我想起沈从文。他曾写,随着“现代”的到来,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灭,“神”“巫”对于他来说,是和道德有关的。他想象中的凤凰由三层权力来统治:最上面那一层是天神,中间那一层是官,第三层则和巫相关。

这样的心灵随着“现代”的到来逐渐绝迹,但在今日泉州,竟还能依稀听闻和触碰到它存在过的血肉。有一天晚上,我打车回远在晋江的宾馆。到达偏远目的地,接过司机递来的车票,他手一瑟缩,转过头来惊惶地说,“你好吓人哦!手比老头子的手还冷!”我本想顺着开个玩笑,又担心惊扰了这位泉州人内心的小宇宙,惊起什么飓风,平添他的恐惧,还

是忍住了。

另一个微风轻拂的夜晚,泉州老牌书店“风雅颂”的女老板连真带我到梨园剧院拜访梨园戏名角曾静萍,她曾获两次梅花奖。在她接待到访黄梅戏团的间歇,我们到露台上观摩一群年轻人练唱梨园戏。他们大都20来岁模样,照着手机屏幕上的歌词唱折子戏,《苏秦》之《送君》。投入之处,一个女孩抬起头,做出舞台上才会有的戏剧性表情和动作,旁若无人,非常自然。我以为他们是热爱地方传统文化的年轻人。教室里的氛围让微醺的风都有了往昔的温柔,仿佛把日历往回翻十年或二十年,人们的神情不四顾、语气不探寻,气息中保存着还不曾奔向远方和未来的旧灵魂。直到穿着运动服的曾静萍上来,她才告诉我,这些年轻人是她很早选拔来的,从他们的童年就已开始培养,是年轻的“老演员”。

57岁的曾静萍是个很严厉老师。晚上练的这个唱段是正式入戏前的开场。她反复抑扬顿挫地打着“多练多历练多”的节奏,把这个开场练了一遍又一遍,不时高声骂几句让大家紧张又忍不住笑起来的泉州话。几天后,他们将在街头表演这一段嫁接了泉州腔和经典梨园戏的唱段,以吸引更多的听众到剧院来听更深奥的梨园戏。

与南音一样,梨园戏是一种有很严谨程式的音乐,保留了很多宋元时期的表演样式,包括那时的肢体和文本语言。曾静萍说,要品梨园戏的味道,“需要长时间的熏陶”,这是很难做到的。遇到与不懂梨园戏的人聊戏,她会感到烦恼,“这本是我们应该坐下来一边品着茶或一边喝着酒,可以聊上三天三夜的事情”。遇知音越来越罕见;普通话的普及使得很多年轻人连泉州方言都不再会说,更无论听懂梨园戏的古音。她现在连孙辈的梨园戏接班人都很难找到,“一张口,吐字咬音都不再是地道泉州话”。在她看来,方言需要“立刻抢救”,有一种急迫性。

闽南话的一些表达很凝练,比如在经典曲《陈三五娘》中有“共君断”这样的曲名,是“与喜欢的那个人生死相约”的意思,简单三个字就能表达。很多俚语从民间消失,但还保存在戏里,比如梨园戏《朱买

臣》本身就是闽南方言的话剧。对连真这样的梨园戏老戏迷来说，“这部戏很迷人，三个小时就如只过了半小时，但又回味无穷”。王建设告诉我，他也非常喜欢这其中朱买臣的大段独白，“他自己一个人在那说，听得懂你就觉得特别生动，但年轻人已很难听懂”。这些老本的语言有的很粗俗，拿人开涮，还有一些双关语的荤话和打情骂俏，闽南人听着很带劲。

曾静萍说，梨园戏里面的许多话语“就是我奶奶那一辈人说的”。奶奶辈的人说话，吐字和咬字特别准，那种七音环绕的味道是浸泡在生活里的，很难“学”来。说话的韵需要生活的积累，需要对奶奶的那一个印象。作为大孙女，奶奶髌骨摔断后，她给奶奶洗了六年澡，每两天洗一次，跟奶奶说了很多话，“现在觉得那段经历特别受用”。

她的奶奶年轻时做生意，待人接物很有个性，“说话很尖刻，而所有的尖刻又都是通过闽南语的俚语表达出来，常常一个字就能说出普通话中四五个词组合起来难以表达的意思”。比如，说孩子虽然调皮但又聪明有智慧，表达一种既爱又恨的情感，一个“yan”音就够了；说一个人迂腐啰嗦、又笨又酸、令人讨厌，一个“神”字就够了，闽南语短促的发音本身就充满了嫌弃的情感色彩；而说一个人“特别好”“好到极致”，往往得先骂一句粗话，有一种幽默的亲切在里面。

虚音也蕴含着很多味道，像“没了”，闽南语念mo luo，“luo”的不同念法能表达很多变化的场景中不同的情绪，一拉长就有讨价还价的味道，斩钉截铁结束则有“不可能”的坚决；让人吃饭，“你夹”“夹哦”“夹哪”，随闽南话发音就能传达出客气、不耐烦，乃至厌恶的情感。

闽南语又是很休闲的语言，韵腔很细腻，“泉州人听梨园戏，过去很少鼓掌，更不要说叫‘好’。就是静静坐在那里，让唱词旋律渗透进大脑神经系统，然后回到茶桌酒桌前，再用绵长的时间细细去聊戏，像这里空气的温度一样”。说梨园戏是保存古音的“化石”，其实它是不断流动着的、鲜活的语言，“靠的是一代代演员通过自己表演，不断的叠加完善”。

我们的聊天不算顺利。曾静萍希望来找她聊戏的人懂泉州话、懂戏，但她又矛盾地认识到，根本不存在“推广”这回事，方言只是生长于这片土地的人的根。在她要求理解却不得的那份孤傲中，在我摸不到深入梨园戏肌理的词穷中，我清晰感受到自己外来者的身份，也清晰触碰到被称之为“泉州人”的那一个内核。

我们说着共同的普通话，但一个有着隐秘情感和独特生活方式的世界存储在被称为“方言”的容器中，它甚至不可翻译。梨园戏是那一层把我们隔起来的表皮，但也正是在这一层表皮内，包裹着泉州人的独一无二性：在无法进入的那个地方，我意识到自己身份的限度，这个限度却同时向我呈现了泉州难以触及的一面——它存在于方言内部，在其中进行着只有泉州人之间才能进行的交流，它是具有私密性的场所。

流动的身份

上世纪80年代，闽南方言学家王建设读研究生时，看不清方向的迷惘中，导师给了他一个建议。“他说《世说新语》这部书很有意思。当中有一个‘许’，用法很特殊，跟我们闽南人的用法非常的相似，用‘许’来表示‘那’”。闽南方言的指示代词是zhi、he，一个是“只”，一个是“许”。正好又是近代汉语，又是方言，两者一下结合了起来。王建设一回去，赶快借书来看。“初看觉得这个词是很有意思，但越看越多，就越觉得确实六朝当时的口语跟我们今天说的闽南话非常接近”。

这个词还不能说明问题。他继续读下去，“比如说典型的人称代词，在普通话里是‘我’‘你’‘他’，闽南话是‘我’‘汝’‘伊’。《世说新语》里，最重要的人称代词也是这三个，跟闽南话口语完全一致”。就这样，古书里的很多东西突然与王建设的日常生活发生起越来越多的关联。在《世说新语》当中有一种称谓叫“阿奴”，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次数比较多。梁朝的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注说“阿奴”是一个小名。王

建设开始没注意，后来发现，“怎么会有那么多人的名字叫‘阿奴’”，心生疑窦。

有一天，他想起来，以前他的祖母就叫他“阿奴”。那还是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我一回家，祖母不会叫我的名字，肯定叫我阿奴”。这说明，泉州就有这种称谓习惯。祖母所叫的“阿奴”不是他的小名，而是普通话里“心肝宝贝”的意思。

在《世说新语》中，它指代的意义是什么？他一边广泛查阅各种古籍，一边回想起来，“祖母可以这么叫我父母，可以这么叫我，甚至我哥也可以这么叫我，但是邻居什么的是不能这样叫的”。在他的生活经验中，“阿奴”是作为一个爱称被应用的，它有限制，只限于被长辈使用。古籍里也是这样：皇帝可以称皇后，奶奶可以称孙子，哥哥可以称弟，这都允许，但是反过来一例也没有。

这样一映证，王建设坚信，“阿奴”的注肯定是刘孝标搞错了，“它不是小名。小名谁都可以叫，但是《世说新语》中，‘阿奴’肯定是只有尊长才可以讲的”。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后来他的论文题目叫《世说新语泉州话证》，一条一条考证《世说新语》中的一些词与今天的泉州话是不是一样。他平日常听南音、梨园戏，研究这些戏文的声韵系统；他也研究生活中的文化习俗，把方言与文化结合在一起。在他与古代人之间，方言仍然是活着的纽带。

泉州流行的一首方言歌曲《来去泉州》是这样唱的：剖剖木成舟，砗泵水中游。門(左右拆开为两个字)双篙桨，行(左右拆开为两个字)到泉州。这四句都是以象声词开头，分别读作：ki kua，砍柴时的声音；ping pong，木浆激水的声音；yi wai，村落里木门咿呀一声打开的声音；xia shua，船在水中飞速向前的声音。其中有一句唱道：“走到十八芝，听老李话泉州”。这位“老李”叫李以健。他在老城深巷里明清时期所建的二层楼老房做了现代改造，一楼是书房和庭院，二楼是茶室和卧室。他说，那四句以象声词开头的歌词是他小时候父亲教给他的，携带着“囡仔”的童年回忆。

李以健对自己“话”泉州的准确性并不十分肯

定，他想写的关于泉州的书也始终未动笔。对我来说，他如何理解活着的方言，也许比有关方言历史的考据更生动。对他来说，真正的老泉州存在于那些仍然虔诚地在神像前终日祈祷的老人身上，泉州话是与神对话的语言。这些老人可以在无论什么派别、事实上常常杂糅的神像前待上一整天，说是自说自话，有时更像对话。有的人天热时带把扇子，不仅给自己扇，还会一边说话一边给神像扇一扇。

在他的观念中，自己所说的方言虽来自中原，但其实已很难标记某个具体的历史时间，也很难再把他与某一个朝代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对历史有很个人的看法，这种看法非官方也非学术，但关乎他对自我的认识。他说，隋朝福建大概只有3万多户人家，一户4.9人，总共才不到20多万人，也没有人愿意来这边做官，就让本地人自己选官。他们无需去京城考试，也无需要得一个官衔再回来做官。

隋朝实行科举制度180多年后，泉州开始有人愿意去参加科举。“一来山高路远，二来语言已不再相通。公元786年欧阳詹去考试时，在京城待了好几年，先学习官话，然后才参加科举中了进士”。他发现，宋朝时泉州有非常多人在朝中做官，尤以“曾”姓为多：从曾公亮开始，到他的儿子曾孝宽，再到曾孝宽的孙子曾怀，再到四世重孙曾从龙，两位北宋，两位南宋，都做到宰相。宋代泉州有这么多人做官，在他看来，和语言相近有一些关系。

元朝的时候，北方语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更北的语言碾压下来，这种语言也改造了北方世界。元朝有三十多年时间中断了科举，文化的沟通交融处于失控的状态，更不用说语言。那个时候的汉人也被分为两个不同的管理阶层，语言的演变非常剧烈，南方则坚守的是曾经的北方语言。中原经过不断战争，语言不断交融改变，而南方还仍然是“永嘉南渡、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直到靖康之变的移民，一代代过来与这里的原住民融合的人。泉州的语言中既保留了本地闽越族的语言，一次次大迁徙又带来不同的文化和语音，融合过程中则是强大者居上。其实已经很难确切地说，我们的语言是什么时候的”。

到了明朝,语言出现了一次大变化。泉州人要去北方,得重新学习语言才能入朝廷。到明朝中后期,才有人考中状元。康熙年间,泉州开了四家“正音书院”,因为泉州人所说的话朝廷已经听不懂,就更别说入朝做官了。泉州的李光地要去考取功名,在北京待了很久,学习当时的北方话,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这已不是普通的士子可以做到的,“要出身有钱的宦人家,才有可能在京城住上一年半载,先学一门语言,然后再去考取功名”。即便是采用统一的书写汉字,但考到了好的名次,最后是要去面君的,也得能与其他朝臣面对面交流,语音的那一部分在这些场合就凸显出了重要性。也是在这个时候,泉州人又从这里开始迁徙,去台湾、去东南亚,把东洋和西洋的文化带回来,继续沉积于此。很多语言从外国拿回来,又成了泉州和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不清楚谁是谁,所有一切都打伤骨头连着筋”。

在李以健家的茶桌上,我还认识了他的朋友颜瑛瑛。这位“80后”对泉州话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情感。在她的书《字游闽南》中,她写,她从小随从事医疗的父亲从晋江安海去闽西多年,一直就是老家人眼里的“山猴仔”,说的都是普通话,放假回到老家才略学一些闽南话,蹩脚的发音吐字一直是亲戚口中的笑料。后来,父亲与她约定每周一日,家中只许说闽南话,听不懂或说不出的词可求助。

十八岁回泉州求学后,她才真正回到闽南话的语境中。“也许是长久的隔绝,闽南话在我心里象征着家园、情义、血脉甚至祖耀那么高的境界。似乎能够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就能够开启那些客居他乡而梗塞心中的种种症结”。她对于“闽南人”这个身份很引以为豪,“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闽南人,是小时候的梦想”。在她的观念世界里,受古中原文化影响,闽南人的传统礼俗和古老遗风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仍根深蒂固,从前辈身上代代相传下来的思维方式在面对传统事宜时并不会会有太大的改变。这些最有生命力的元素都保存在闽南语的字词中,透过对这些字词的理解,“或许我能够找到一种生命本原的归属感”。

她在书中对“生分”(si hun)这个方言词所作的解释,很能窥见泉州人的性情。“生分”的字义本是“活生生分离”,是夸大其词的用法。到人家家中做客,主人请你点心或喝茶,你若是推诿一番,主人就会说,别生分啊。小孩子怕见生人,如果在生人面前扭捏,家长就会说,这孩子很怕生分,意思是不敢与陌生人接触。将人生中生离死别的痛苦用于形容这些平日的芝麻小事,有一种闽南人的烈性。就像说“很久”这个词,闽南人要用“万代久”“这样的形容词仿佛才觉得过瘾。而到了真正的“生分”,在闽南语中却反而被一些很淡的词语一笔带过。比如,恋爱中的男女若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经历各种波折、要生要死的斗争最终还是不能在一起,闽南话说“无缘”;弟兄反目朋友殊途今生今世彻底分开不得和解这些事情,却被轻描淡写地叫做“勳斗”,即合不来——这是另一面的性情。

与普通话的四个声调不同,泉州话是七音体系,过去有文读白读之分。“文白读”之分,就是“语”和“文”分治,“语”是口头语,“文”则是文言文,有其作为正式语言的发音。过去,正是这种文言文书写和读法的传承构筑了一个士大夫独有的封闭语境。以前书塾的启蒙教育注重字音,读古文的书要边读边发音,一个字发音不对会得到先生的纠正,字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口口相传的。1949年以后,新学堂用的是新课本,学普通话,方言和文言文的阅读,以及与其相关的严格字音教育也逐渐失传。如今,只有在老一辈人的讲述中,我们才能一窥曾经存在过的方言的面貌。

泉州德高望重的文史家、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前馆长王连茂说,他20岁高中毕业后,在泉州市政协做口述历史的工作,接触的都是清代的老人,有的是进士、举人或贡生。“他们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到政协学习时事政治,有时就由我这个年轻人用泉州话为他们读报纸的重要新闻。有一次读到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当场纠正我,‘暴’与‘骤’的文读音错了”。

发音吐字时,他还能感受到传送于气息之间的

历史分量:隋代陆法言编著的《切韵》,是根据汉晋洛阳雅音以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韵书,唐人奉为典规,基本不变;闽南人既然来自中原,他们带来的语言自然是四世纪的河洛官音。历经唐初(669年)陈元光随父陈政率军入闽和唐末(885年)河南人王潮、王审知三兄弟率军入闽,以及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很多中原的北方人,特别是官僚,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著名的人物,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文人、诗人等纷纷退到福建。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语言经过好几代战争和融合,早已不再是原来的语言,“变成我们一直不变”。

加之中国的科举制度将文本教育一直持续下来,“泉州话虽会有一些变化,但它的变化主要还是容纳,而不是改变”。如今,年轻人已不再为泉州话感到自豪,觉得方言与普通话相比显得土。已80岁的王连茂说,“没想到过了60年,我当时读错的字音,如今已经没有人说你是错的了,因为人人都这样读”。那些透过方言的韵律回响在人们耳边的历史,也就此悄然远去。

在泉州的这几天里,泉州人见面喜欢问我,“第几次来泉州?”“什么时候再来”?对于一个定居在北京的成都人来说,这两个问题并不那么自然而然的:这里面不仅有来去,还有一种流动性。对泉州人来说,来去此地是稀松平常的事,他们本就是侨民的后代,后来又做了别处的侨民,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可能离开再回来。他们告诉我,对他们来说,来处是中原,这是深埋在历史潜意识中的“故土”,对这个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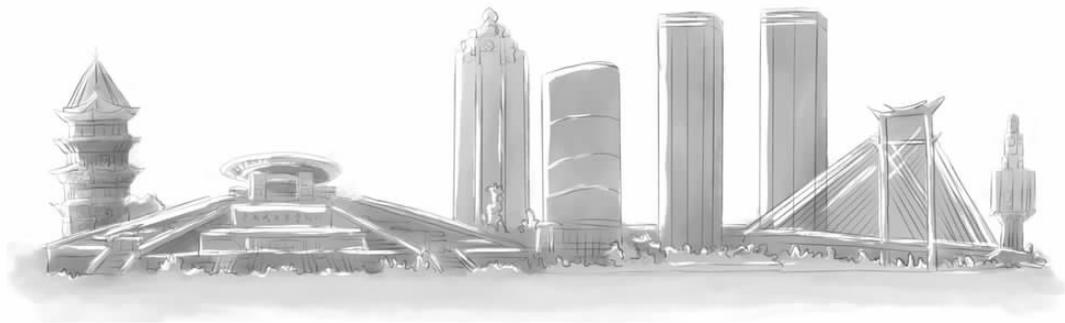
的怀念是两千年遗传下来的潜意识;可是那个“故土”究竟是什么,早已变得模糊不堪,不再有明确所指。

中原再也回不去了,慢慢也不愿意回去,他乡便已成为故乡。故土的观念却依然深厚:从泉州去东南亚海外的侨民,要寻根,回的是泉州,这里便是“去处”。在历史长河中,“身份”或是一艘不断变化的“忒修斯之船”,或是垒叠的地层,但让“过去”存在下去的冲动却成为泉州人身份本身的一部分,成为一件庄严的事业。方言和它的乡音,就是一处流动的庇护所。

李以健说,曾经有两个摩洛哥音乐家循着旅行家伊本·白泰图的书来过泉州,到他家拜访。临走时,他送给他们一对摆在庭院里用作摆设的一对滴水兽,嘴对着嘴朝向天空。那本是放在基督教堂里的,华侨学回来,演化成泉州人喜欢的样子,放在庭院中做装饰,它就成为一件日常用品。我离开泉州后,他款待随后到达的摄影师。在尚有柔风吹拂的夜晚,他的朋友们一些坐在庭院中弹着吉他唱着歌,一些坐在里屋书房中打牌。尽管历史的“身份”变动不居,对个体来说逐渐变得模糊,但这份小日子里的闲适却是恒常的。他们这样唱:

树顶的蝉蛹西(知了)还在喋喋不休,庙口的看命先生讲话是南安腔。……老君的大大耳仔长长的胡须,清静无为有什么忧愁。伫清源山顶看古城的月娘,一半照人间一半写文章。

(2020年51期 《三联生活周刊》)



何建华：发力打造江苏高质量发展“沿海轴”

得益于承东接西、呼应南北的特殊地理位置、经济实力 GDP 在长三角区域占比达 42% 以及人口占了长三角区域三分之一的人文优势，江苏省在长三角版图中占据着“C”位中的“C”位，无可争议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性“硬核”区域。策应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江苏提出“省内全域一体化”，切实推进跨江融合发展与全域一体化发展，形成“两争一前列”发展新态势。将沿海发展放在全省江海河湖协同发展格局中系统推进，在国际竞争格局和全国区域布局中找准坐标、高点定位，发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沿海轴”，使沿海发展战略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在相融中形成叠加效应，成为江苏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江苏沿海发展战略落地落实时至势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地图的演变，可以明显观察并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江苏沿海发展潜力优势日益凸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征程上推动江苏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渐成，发力推进江苏沿海发展将使这片蓄势后发区域成为江苏“两争一前列”潜力巨大的新发展轴、强动力源、高增长极。江苏沿海发展的时与势，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资源禀赋富集。江苏沿海地区包括南通、盐城、连云港三个设区市，总人口 2115.57 万人，土地面积

3.55 万平方公里，滩涂面积达 5000 平方公里。江苏沿海这三座城市各具特色、享誉海内外，加上纳入沿海地区开发整体布局的淮安、泰州、宿迁，是苏中苏北的精华集聚之地。以盐城为例，沿海中部区位及漫长海岸线优势，可打造出开放高地；1.7 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可开发潜力大；拥有东方湿地之都、仙鹤神鹿世界、黄海森林公园等绿色生态优势；红色文化、绿色文化、盐文化等人文历史资源深厚。

区位优势凸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速深化落地落实，正在也必将重构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新地图，在原有发展基础即沪—宁—合发展带、沪—杭—甬发展带的格局中，形成两条新的发展轴，那就是沪—苏—湖—宣—合发展轴、沪—苏—通—盐发展轴。对江苏来说，发展重点由先发苏南朝着后发苏中苏北同频共振发展新阶段，必将使沪—苏—通—盐成为新的重要发展轴、增长极，其辐射带动效应延伸至连云港是必然趋势。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推进与逐步完善，江苏沿海地区特定区位优势日益凸显。

发展潜力巨大。江苏沿海地区通、盐、连三市具有较好产业基础，工业门类相对齐全，汽车、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已成为主导产业；建筑业、旅游业、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以海工装备、康养旅游等为代表的海洋产业比较优势明显；土地储备较为充足，农业产业规模较大。在苏南苏中苏北经济发展格局中，江苏沿海地区属于后发区域，近年来发展

潜力日以激发,经济总量不断扩大。2020年,沿海三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66.8亿元,剔除价格因素,同比增长4.0%,比全省平均增速高0.3个百分点,总量占全省的18.8%,其中南通增速全省第一,跻身万亿俱乐部。

战略能级增强。一体化发展将使长三角形成世界级的高质量发展区域集群,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万里长江入海口的三座名城——上海、苏州与南通,正率先发力、携手打造长三角一体化进阶版的“黄金三角”,沿海地区的南通聚力打造“北上海”,将成为江苏沿海发展的新引擎。同时,伴随着山东沿海铁路与江苏沿海铁路对接投入运行,一条东部沿海大通道正在形成,未来将穿越连接浙江、福建、广东,成为我国具有战略储备意义的强大动力源与增长极。站高望远,江苏沿海发展的战略能级将不断提升增强。

将通盐连“沿海轴”打造成苏锡常“沿江轴”

全方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江苏热点在苏南,重点在跨江,难点在苏北。对标苏南发展,江苏提出要认识到苏南苏中苏北是一个地理概念、不能成为一种固化意识,地级市是一个行政等级、不能成为发展的能级限制,要继续解放思想,把握规律,进一步摆脱“地级市思维”和传统的“苏北意识”,以高度的定力坚定不移朝着既定目标努力。显然,苏中苏北的崛起发展是江苏未来发展的巨大动能潜力,应当聚焦重点、破解难点,疏通堵点、发力亮点,推动沿海地区成为苏中苏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一是加快建设综合交通枢纽。沿海要实现大发展,增强交通基础设施的综合支撑力和便捷通达性尤为重要。南通应当以新出海口为引领构建双向开放通道,着力建设国际一流港口、加快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全面构建现代化运输服务体系。连云港着力建好连接全球的东方大港,巩固陆海联运的“第一品牌”,构筑连接东西的开放门户,加快打造双向开放示范带,在“交汇点”大局中展现“强支点”担当。盐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加速起势,随着盐通铁路

建成通车,盐城全面迈入“高铁时代”,城市价值显著提升,正在加快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全面提升盐城港服务能级,努力将盐城港打造成为清洁低碳、智能高效的绿色生态大港。

二是构筑产业集群创新高地。沿海产业发展应当以创新为引领协同打造现代产业链,实现产业基础转型升级高级化,按照现代化分工、高科技支撑、大生产需求实现产业链现代化,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不断跃升。南通提出以重大项目为抓手培育硬核产业集群,以大项目培育大产业,在经济规模上再造一个南通。盐城向海发展、向海图强,“产业强市”蹄疾步稳,加速推进绿色转型,全力打造汽车、钢铁、新能源、电子信息四大主导产业,加快建设长三角北翼产业高地,同时擦亮中韩合作品牌优势,放大进一步对外开放感召力。

三是布局城乡融合城镇体系。我国城镇化进入现代化建设新阶段,江苏沿海应当以新型城镇化为目标,以城镇体系为支撑塑造滨海特色风貌,强化规划引领、塑造滨海风貌、提升功能品质。盐城对标打造具有鲜明生态特色的滨海之城要求,坚持以绿色共享为引领,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一个个特色镇村犹如颗颗明珠遍布沿海各地,绿色共享打造幸福沿海。连云港注重发挥独特资源禀赋优势,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提升城市品质、彰显海滨特色、加速乡村振兴,着力构建滨海特色城镇带。

四是培育绿色生态最美廊道。江苏沿海拥有亚洲最大海岸滩涂湿地的资源优势,对调节气候、减缓风暴潮灾害和净化环境等具有积极作用,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态防护林体系和自然保护区网络,其中盐城黄海湿地成为全球第二块、国内唯一的潮间带湿地遗产,填补了我国滨海湿地类型遗产的空白。通盐连三市应当发挥大自然馈赠的资源优势,以绿色生态为导向打造沿海最美示范,统筹做好治污、添绿、留白三篇文章,着力培育绿色生态最美廊道,展现江风海韵独特魅力。

五是创造美好生活人文意境。江苏沿海发展应

当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高度，着力改善民生，深化社会治理，抓牢安全稳定，实现安全与发展“双轮驱动”，用情建设幸福宜居样板区，营造“三生融合”美好生活人文意境，打造最美江苏示范样本，让人民群众真正共享沿海发展成果。

采取切实举措推进沿海发展的思考建议

在长三角一体化深化推进落地实施中，一个共识正在形成：江苏沿海是撬动苏中苏北整体发展水平提升的战略支点，是支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要地，是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如何借鉴参照苏南地区的苏锡常“沿江轴”发展模式，将通盐连打造成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沿海轴”？提出如下思考建议——

路径选择：“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结合。“由上而下”是在省委、省政府的统筹下，在贯彻国家战略要求、顺应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大框架下，建立沿海发展合作机制，进行沿海高质量发展的顶层设计，力求融合协调发展，又要突出各自特色。“由下而上”就是通过通盐连三地平等互利地进行分工合作，形成良好的联动发展格局，在长三角乃至全国起到示范作用，为我国区域发展政策提供经验借鉴。

规划先行：以第三方平台深化沿海发展规划研究。发挥规划刚性制衡作用，统筹规划沿海高质量发展，坚持系统思维、突出沿海特色、加快规划编制，以

科学的规划指导推动沿海发展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应当借助市场化和社会化力量，公开向社会招标，与三地相关部门一起，组建沿海高质量一体化规划机构，根据长三角区域规划以及三地各自的发展战略，统筹规划沿海发展战略。在沿海发展战略基础上，发挥各专业委员会、区县委员会和战略推进委员会作用，组织推进各专业规划，一张蓝图绘到底。

利益共享：推动形成沿海发展一体化同城化共同体。通盐连三市应当形成一种良性的竞合关系，强化沿海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思维，突破行政藩篱，推动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协同建设，进行产业与科技创新合作，构建科学、高效的协同发展机制，实现社会发展领域、生态与环境保护等全方位协同发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贸易自由畅通、投资交融互利等方面实现优势互补，构建一体化的区域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同时注重保护不同区域城市间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空间的差异性，使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多样性相融共生。

舆论引导：扩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形成沿海发展共识。将沿海发展作为江苏“两争一前列”品牌擦亮打响，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大力进行宣传推广，以各种形式向长三角乃至全国和世界展示沿海发展的战略选择必然性和内在发展规律性，不断提升知晓度、美誉度、引力度。

(何建华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南通大学长三角城市群新发展研究院院长)

(2021-07-26 澎湃新闻)